

探寻“第三空间”：虚实共生场所的建构与运用

——以演唱会中的场外参与为例

吴瑶, 刘子涵

(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2)

摘要: 在技术发展与交往变迁的双重作用下, 临时汇聚起的“流动空间”越来越成为人们建立连接的重要场所, 也为美国学者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a)的“第三空间”概念赋予了新发展和新内涵。以演唱会的场外临时空间为例, 出于“打破交往不安”及“抵御线索消除”的心理, 人们对具身感受的追求成为构建“第三空间”的动因。在空间建构的具体过程中, 现场基础设施和交叠于其外的赛博世界, 分别起到了强化感知和促成共在的作用。同时不可忽视的是, 这种高度自由的空間中也同样存在隐性权力, 而通过温和的方式合理利用这些权力规约, 则为助力群体动员、推动群体意志的高效传播提供了与时俱进的新思路。

关键词: 第三空间; 空间构建; 演唱会; 群体动员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18 (2024) 04-0002-10

从作为重要交流场所的希腊城邦, 到如今各种极具特色的城市空间, 对话与互动依赖于形形色色的空间展开。但以往人们却普遍持有“空间是时间的背景”观念, 空间研究仅被定义为地理学家的工作。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空间转向”潮流, 转换了人文社会类学科探索社会的视角, 使空间研究逐渐成为传播学界的重要议题。马克思主义空间观强调, 空间是运动着的人类存在方式之一。^[1] 即空间并非一成不变的固定“地方”, 而是一个经由人与环境不断互动、适应, 最终产生新反应的建构过程。因此, 超越纯粹虚拟或物理地方的、更具复杂性和流动性的“第三空间”概念被描绘出来, 用以解释生活空间中共在的物质、精神及人的感知体验的联系。

近年来, 学者在对“第三空间”的解读中赋予了其现实意义, 主张将其看做虚实空间的接合点, 从而应用于多种现实领域, 如经由多元化感官参与的实体书店^[2]、在人的“停集”中建构媒介空间的报刊亭^[3]等。这类研究多聚焦于传统空间中的现代化特质, 意味着空间研究逐渐拓展至以往被忽视的“混合区域”, 或转而关照由特定群体重建的新空间, 因此对传播的微观视角发掘带来了重要意义。

事实上, 即使第三空间研究已在多个领域被验证, 其具有超越传统的形而上空间、打破二元对立的探讨价值, 但随着媒介影响范围的逐步深化, 学界对纯粹赛博空间长盛不衰的探讨, “使得‘空间’概念已经被传播研究的抽象性所笼罩, 压抑了人们对自然的、物质的和实体空间的思考”^[4]。因此, 重寻第三空间, 也成为未来空间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要理解和发展上述视角, 需将现实的个案纳入这一范畴之内考察。2023年上半年, 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15.19亿元, 迎来了演出市场三年多首个爆发窗口期。^[5] 当恢复繁荣的演唱会市场与有限的门票数量出现冲突时, 无票但仍愿前往场馆外进行“陪伴式参与”的听众实际上就构建了一个位于正规空间之外的“第三空间”——既无严格地理界限的制约, 又有别于线上分散的虚拟空间。因此本文试图从演唱会的场外空间出发, 提出两个问题: 因时而存在、因人而构建的“第三空间”, 其形成的原

因和条件为何?在具体实践中,人与媒介如何参与实体空间的建构?本文尝试分析散落于现实地域中“第三空间”的形成原因与构建方式,意在丰富空间理论的一个侧面,并对不断变化着的群体行为进行再审视。

一、“第三空间”理论综述

区别于传统描述物理世界的“第一空间”、描述精神世界的“第二空间”,“第三空间”理论是空间研究中的极具独创性和时代性的理论,发源于列斐伏尔等人对空间生产或规训的探讨。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于1974年发表了《空间的生产》一书,这一著作也被视为空间理论正式形成的标志,为索亚、奥登伯格等人提出和完善“第三空间”的正式设想奠定了基础。列斐伏尔在该书中提出了三种描述空间的维度: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及表征的空间,使其共同构成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社会空间。^[6]这一视角打破了以往传统的空间二元论,在跨学科立场上把握了日常生活和空间生产的辩证法,也为人文地理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变革性方法和一种哲学思考向度。

在借鉴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基础上,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在批判“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两种空间理论的基础上,率先提出“第三空间”(the third place)的理论,意在描述一种既不拘泥于客观物质性,又非全然被构想的、社会性的空间。其关键点在于“他者化—第三化”,即力避空间研究中的过度简化视角,将非此即彼变为亦此亦彼,从而打造一个自由流动的社会空间。爱德华·索亚认为,空间不仅受物理环境和空间组织的影响,也受人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既有实际的存在,更是一场通往“真实和想象的旅程”^[7]。因此,索亚的“第三空间”既是对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的借鉴,更在此基础上对空间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展开进一步阐释与强调,进行着“第三空间”的意义完善和体系构建。

继索亚的理论创设之后,关注种族与跨文化问题的后现代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从文化角度发展了这一理论。霍米·巴巴提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存在的一个特殊的“第三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个体的主体意识和身份诉求不再受到原有文化范式的限制^[8],而是更具有对话性和混杂性特征。而在生活与消费空间领域,美国社会学家雷·奥登伯格(Ray Oldenburg)在阐释非正式公共聚会场所重要性时,也曾涉足过“第三空间”这一研究领域。他在《绝好的地方》(*The Great Good Place*)一书中指出,“第三空间”介于家庭和工作场所之间,是一个“平等交流、流动参与”的全新空间。^[9]这一拓展更贴近于真实的生活空间状态,因而被广泛应用于各领域的场景营销和城市规划当中。

在“第三空间”理论被引入国内并指导媒介实践的过程中,相关学者立足现状,提出了诸多有益的研究成果,其研究对象也不断与深度媒介化的社会特点相契合,为本文的理论延伸提供了更多参考思路。如潘忠党等人深挖奥登伯格“嵌入城市生活的第三空间”意旨,探讨了上海“我嘉书屋”打通物理与虚拟、生活与工作空间后所构建的新场景,^[9](63-64)]从而梳理了地域与传播互构下的空间可供性。王海峰阐释了边缘性群体的生存状态,指出其构成的边缘空间是一种“媒介与城市的互嵌复合体。”^[10]。而胡翼青等人也立足媒介城市与空间的探讨,并辩证性地提出了国内研究应将“第三空间”构想落于实处的期待。^[11]

综上所述,虽然参与“第三空间”建构的学者们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对这一框架的解释也存在偏向差异,但索亚“第三空间”的核心却是适用于致力于找寻一个多种要素相融、自由开放的流动空间——这也正是本文理论的立足之处。本文“第三空间”所指涉的,是一种虚拟性与物质性交融、个体性与社会性交融、可相对自由地进入与退出的空间。如演唱会场外的听众既能实现个人身体的在场,

又能通过移动设备实现信息的流动与共享。事实上,索亚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其理论的解释最终仅停留在“真实与想象的交融”,而没有对当今深度媒介化社会中充斥着“现实与虚拟的交融”作出预判。但很显然,在目前新出现的传播现象中,后者的组合作用尚在不断凸显,因此对这一理论进行与时俱进的发展,也存在更多的必然性。

随着媒介化研究的日渐深入,空间与媒介的结合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在一个非既定的空间中,人们既可以利用其中的固有物理媒介作用于在地的实践行为,同时也受到线上媒体、精神想象的制约。即,“第三化”特征应成为空间理论的重要命题。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探讨网红城市空间的媒介化转型,还是街头巷尾咖啡厅与书屋的场景打造,现有对于“第三空间”的实践研究大多仍是聚焦固有城市单元的重构。但事实上,“第三空间”不同于绝对空间的概念,它不一定是稳定存在的,更倾向于为人暂时建构的。翟晶指出,第三空间的特征,是“使得任何意义都必须通过翻译、协商的过程来获得临时的合法性”^[13]。尤其是当虚拟互动、增强现实等技术成为生活的重要调剂后,人们的随机卷入和退出,使得第三空间的临时性状态更加成为一种常态性现象。因“人”的参与而形成的、“加入而不深入”的拟在场空间参与,是社会广泛存在的一类情形,故而有必要对作为延伸的“第三空间”加以诠释。

二、研究方法：基于参与和访谈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取了参与式观察结合部分深度访谈的方式。在剔除 TFBOYS“十年之约”这类已被媒介事件化的演唱会后,选择大麦网预约人数较多的两场演唱会:张杰“未·live 曜北斗”武汉站和周杰伦“嘉年华”世界巡回演唱会上海站,于 2023 年 5 月和 2023 年 10 月前后采取亲临现场和加入微博话题讨论的方式,展开参与式观察。

在亲历现场时,场馆内外的基础设施、开放程度(如图 1)等,以及分布在围栏之外、共同营造“第三空间”的人是观察的重点。这些人既包含学生、又包含表露出职业特色的社会人士。既有武汉/上海本地居民,也有从邻近省市赶来的外地人士。此外,在线上询问时间路线或其他资讯、找“搭子”一类的媒介文本也归于讨论之中,作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

同时,笔者通过对活跃程度较高、主动发言或发帖的参与者进行随机抽样,在现场聚集者和网络讨论者之间寻找了 10 位受访者(如表 1:J 指武汉张杰演唱会,L 指上海周杰伦演唱会)。访谈的主要问题涉及受访者进行自主参与、并积极构建空间景观的动机,在这一空间中感受到的综合体验,以及参与前后对媒介与社交的感知与看法等。同时,笔者积极与其他参与者进行线上线下交流,以确保信息的饱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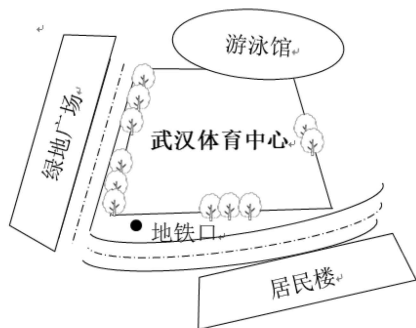


图 1 以武汉体育中心为中心的周边示意图

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

序号	职业	年龄	暂居地	前来目的
J1	学生	21	武汉	学校近，来凑热闹
J2	学生	23	长沙	粉丝陪伴
J3	学生	19	武汉	路人粉感受氛围
J4	媒体运营	24	武汉	路人粉感受氛围
J5	外卖员	29	武汉	粉丝陪伴
J6	教师	27	武汉	路人粉感受氛围
L1	学生	21	上海	感受情怀
L2	学生	24	南京	粉丝陪伴
L3	自由职业	26	苏州	感受情怀
L4	国企员工	32	上海	家住附近来凑热闹

三、因何建构：交往信任与感知强化

本文所强调的“第三空间”在形成过程中，必然会伴随客观原因的参与。如在演唱会场外视域下，因“无票”所带来的地理隔离，是人群自发聚集的直接因素；而在当下复杂的社交环境下，纯粹的线上聆听也难以再现具身参与的同等价值。自愿跨越物理区域、实现这类“拟在场”的原因，是探讨空间建构时应首先回答的问题。

（一）从虚拟到物理：交往不安助推“再地缘化”

首先，网民以趣缘为基本关系建构了庞大的线上空间，但无法深入的表层社交给实践个体带来不安。喻国明指出，趣缘关系已成为数字文明时代的主导型社会关系，人们广泛接入数字网络，故而在多种网络群体中来去自如。但众学者也表达了对其背后隐忧的反思：“网络趣缘关系由于互联网媒介可供性的局限，致使其将弱关系转化为强关系的效能不足”。^[14] 日益发展的虚拟技术联结了世界，而网民长期在精神世界的穿行却架空了人与人之间基础的信任联结。在这种趋势下，当代网民尤其是青年人发现只依靠“短暂热聊”建立起的网友关系难以走向长久化，故而厌倦了这种架空所带来的浅表社交。他们对暂时逢迎和虚拟偶遇大行其道的网络空间逐渐表现出极大的不安，如演唱会外的受访者 J6 所言“缺乏一种彼此熟悉后的共鸣”。因此，“去电子媒介化”，从而重新回归线下也成为其强烈意愿。

其次，虚拟现实技术虽然复制了现实空间，但感官在虚拟空间中的极致体验并未能与现实世界进行交互，无法还原的实地共在体验给实践个体带来不安。如在各种活动和赛事中广泛运用的 AR 拟真技术，如若失去相应的场馆或辅助媒介物作为依凭，则很难还原实地交往的共在反应，离身的限制依旧存在。因此，纯粹线上的趣缘连接尚不能替代具身参与中的互动体验，也就无从获取与后者相同的情感。人们“无法触碰”的不安全感并未因为虚拟技术的运用而解除。在此情形之下，空间拓展的“再地缘化”的概念被重新提及——但这种“地缘”并非传统意义上由地理场所构成的绝对空间，而是将趣缘纳入地理版图、将社交媒体纳入现实空间后的一种虚实结合的新型地缘空间。

最后，人们渴望在这种虚实结合的物理场所中寻找慰藉，积极用行动共同书写着这一场所的构成

逻辑，共在的外部围观因此成为人们在“第三空间”中实现地缘连接的直接方式。如参与者 L3 谈论自己专程从苏州赶来的原因时讲到：

以前有疫情的时候不敢到处跑，有演唱会也只能窝在家里看别人的抖音直播；现在不用担心疫情了，就会觉得别人在现场我不去心会很“痒”。再说，微博上发的视频清楚是清楚，但没有大家一起发疯更“有感觉”。

面对面交流能够促使交流双方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去完成谈话，这就会为亲密关系的建立或巩固提供契机。^[15] 他们可以避免刻意社交而随时从围观中撤出，也能因为地理接近而选择直接获得一段“强连接”。所以，与单纯线上依赖图文的评论互动相比，并不脱离网络但仍以现场作为围观与交流基地的“第三空间”，为安全感的构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屏障。曾经依靠虚拟在线进行围观的人群，以一种想象共同体的形式存在，保持着节点化的关系。如今，线下的实体围观者则以地缘作为认识和互动的索引，同时背靠广泛使用的媒介技术，突破节点，实现共在连接。

（二）从离身到具身：在地陪伴抵抗“线索消除”

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提出，身体是媒介，是“连接可见物和不可见物的沟通渠道”^[15]。当作为现实的个人同处于某一空间时，身体就被赋予了传播情感与信息的使命。作为语言符号的重要补充，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等非语言符号都承担着“含蓄式”表情达意的功能。这些具有某种特定社交意义的指示被社会学家统称为“社会线索”^[16]。但当远程的屏幕与文字取代了面对面沟通、成为交流的主要方式后，身体原有的表情达意功能也面临着极大压缩。1987 年，库尔兰（Mary J. Culnan）等人提出了“线索消除”理论（cues filtered out theories），用以指代这种建立在文本处理基础上的网络交流，认为其导致了对话状态的“真空”。^[17] 这一理论阐明了纯粹虚拟空间对深层社交的不利影响，也使学界展开了对缺乏社会线索空间的进一步思考。

同场域参与者们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及相互拥抱，构成了在地交往中的完整线索体系。如果没有这些社交线索的存在，用户的认知感知过程可能不会被激活。^{[16] (85-87)} 因此，丰富社交线索的消减乃至丧失，对人们基于情感的传播实践产生着负面影响。尽管在智媒时代，通过虚拟技术可还原线上交往的现场感，但相比于直面交流，非语言符号的隐退使得虚拟网络用户依旧会丧失流露自我身份线索的机会，只能“交流”而无法真正“交往”。而在地陪伴由于其固有的可触碰、可感知特性，更包含了身体展演与情动的色彩。人们渴望身体回归下线索的重拾，在这一过程中，落于实地的“第三空间”为其创设了可能。

“第三空间”的形成有赖于身体的触达和技术的联结。其一，身体是丰富社交线索产生的基础逻辑，亲身在场能使人们更容易察觉他人的信号表现，重现被“消除”的线索，拉近参与者之间的距离。在演唱会场外的聚集中，共享听觉空间的人们可以拥抱、可以欢呼，可以通过对歌手或歌曲的共同记忆重塑。其二，可连接的技术也叠加了场外的赛博空间，人们通过手机直播和实时动态，将这些社交线索传达到更广泛的远方，激发其另一场域的情动。听众在完成记忆书写时的打卡、分享行为，既是具身的展现，也是媒介调节人的实践和知觉的过程。即实体空间成为一个承载集体记忆、寄托共同情感的媒介，推动情感实践与交往实践的发生。

在武汉张杰演唱会的场外，一位特意赶来的本地外卖小哥（受访者 J5，如图 2）作为“十年老粉”，站上电动车挥舞应援物表达对偶像的喜爱，并将“网红小黄鸭”免费赠予在场粉丝，在“送与接”“呼与应”的肢体表达中建立了身体互动。随后，他还通过呼吁群众一起唱应援歌的方式，让更多人能够相互靠拢欢呼，创造出了更多充斥空间的社会线索。由歌曲唱响和共同欢呼形成的仪式，作为

无可取代的催化物, 为集体性具身空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此氛围之下, 在此的非粉路人也会受到程度不一的记忆唤醒: “周杰伦的歌从小听到大, 现在有时候听见那些前奏响起来, 会觉得人不再年轻了 (L1)” “张杰的《勿忘心安》对我有不同意义, 这首歌伴我走过了高中的艰难岁月。(J1)” 在此情境下, 即便这个“第三空间”具有临时性, 诸多丰富的社交线索也能够将身份各异的人聚集起来, 并通过增强集体意识, 塑造起与其他场所相分离的空间壁垒。这些本身不抱有极强目的性的外围听众得以延伸出无数心流的交汇, “第三空间”因此拥有了建构意义。



图 2 外卖小哥站上电动车与粉丝互动

四、如何建构：物、媒体与身体共谋

(一) 设施作为载体：物质基础强化感知空间

作为“第三空间”理论的源流之始, 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的实践”的概念, 认为物质化的、可以被观察到并且可以由经验描述出来的客观存在, 是可感知的物理意义上的环境, 也是第三空间的物质基础。^[8] 倘若割裂了与实体空间的关系, 媒介构筑的虚拟空间就很难在现实社会场景得到真切的理解。因此, 在空间的构成与生产中, 基于现实空间的物质性是探讨的第一步。从传播的角度, 理解、关注包括建筑物在内的实体空间对人类交往活动产生的影响,^[18] 从实体空间及其中的建筑和设施角度阐释了空间研究应有的重要关照。作为媒介物的设施与建筑物规定了一个空间的粗略边缘, 却也为其中的媒介实践提供了延展的灵活性与可能性。

空间中广泛存在的各种实体媒介物, 能够起到支撑交往、传递感知的作用。而“第三空间”中的实体媒介物, 既包含作为城市点缀的自然物, 也包含作为硬性规划的建筑物。对前者而言, 草木、灯光等自然物质的添加, 营造了实践者参与的氛围与感知空间。而对后者来说, “广场、街道、建筑物等等, 都是非常重要的构筑意义、传递信息的媒介”^[18](47)], 城建设施的存在是意义传播的载体, 因而增强了空间本身对外的吸纳能力。这些城市构建的环境让形形色色的地方发生互动, 在符号化的编码中, 将空间和人们进行重新排序、连接或分隔。

以武汉体育中心为例, 笔者于 2023 年 4 月 30 日当天演唱会开始前, 便前往体育中心附近, 对周围环境及已经汇聚起的群体活动进行了观察。观察发现: 四周的马路、商业街以及居民区建构了一个开

放性的空间,是人群分散却又能形成聚集的前提。体育中心的围墙栏杆和马路对面的高大建筑首先限定了这一空间的基础边界,将其中活动的人物包揽在内;而场馆外掩映的树木则软化了空间的强制意义,树边的花坛、与场馆遥遥相望的建筑台阶更在空间内部为参与者设置了“停泊之处”,使其得以长时间停留而非只是瞬间在场。尽管道路受到交通管制的约束,流散的人群却因其小体量特征,仍能在权力的缝隙中获得生存空间。同时,四散的地铁口作为联通多种空间的媒介物,又为主动参与者的加入和退出提供便利,从可行性的角度构筑了人们的共同意愿,内外因交织的空间布局成为“邀约参与”的信号,因此产生了情感的可供。

除了亲临地面的参与者,附近居民楼的地理区位也为空间边界的延展和其他外部群体的吸纳提供了更深层次的动力。“演唱会出现了新物种阳台票……社交平台上出现了不少寻租阳台、出租阳台的帖子。”(微博网友 @stlbh)“最大的快乐是杰伦在我家小区对面连续四天演唱会,坐在家里就能听到。”(微博网友 @Cinderella 井井)这些居民未必以粉丝身份参与到空间中,更多是出自一种偶然性,但当演唱会这一活动特有的声音力量穿过人工划分的块状区域,便营造出了不同于别处的倾听景观。演唱会场外物质元素或远或近的参与,映射出其作用于行走者感知的积极作用,因而为理解其他充满自发性和流动性的“第三空间”框定了参考程式。

(二) 信息作为桥梁:网络媒介搭建共有空间

“第三空间”的另一重指向是作为虚拟和想象的空间,即关注实际地理场景中的媒介体验。如果说空间中的建筑和设施作为载体,打通了人们的参与的可能性,那么强大的网络媒介和用户数据成为物理空间的附着物,继而重建了虚拟与实地间的联系。在深度媒介化的第三空间内,数字技术嵌入到既存的地点中,挪移了时间、空间和语境,而且改变了人们的交往关系和思考、行动的方式^{[11](172)},诸如社交媒体的信息交互和位置媒介指引等功能,令参与者不仅能结成特殊场景下的“瞬间团结”,还可扩大交往场景、延续长期关系。

对移动社交平台进行工具性使用,目的是获取信息资源或有意识地谋求陪伴。当问及是否持续关注演唱会信息,许多受访者持否认态度,“我是看见微博有人说7号门能听得很清楚,想感受一下所以就过来了。”(J4)翻阅微博和小红书相关主题,亦能轻易找到这类求助贴,如“哪个门听得清楚?”“现场有什么活动吗,没有就不去了。”即相当一部分在场者并未在演唱会官宣时参与话题讨论,他们游离于由粉丝书写的超话社群之外,却又因参与了丰富的数字生活,偶遇在各平台流动的相关信息,在对信息的想象再构之下主动转换观看的空间,最终以共同围观的方式邂逅这场盛会。

因此,“信息偶遇”成为大多数人进入倾听场域的起点,而随机位置媒体的大展拳脚则使后续的行动更为自然便捷。如今用户逐渐接受了对自身空间地理信息进行主动暴露,并乐此不疲,“我们留下的数字踪迹构成了我们的物理世界。”^[19]百度街景地图、微信共享位置等技术服务,显示出地缘群体对媒介化嵌入生活的适应与书写。在演唱会场外视域中,由这些空间信息带动的位置媒介实践有两种形式:其一是通过微博的IP显示寻找周边有共同兴趣的人;其二则是直接在线下通过微信共享位置寻找在场者。其中,参与者J3提供了自己的经历,可窥见这一群体是如何以位置媒介搭建组织化场景的:

小红书上说张杰要来开演唱会,就加了蹲场外的微信群。群里的大粉会提前去占好位置,到时候直接给大家开微信(位置)共享,我和两个姐妹加了好友一起去打卡,后面还跟其他人聚了餐。

J3的经历并非个例。在周杰伦演唱会前,笔者也曾加入相关群聊,发现群中“帮忙占位置”“开位

置共享”等请求比比皆是,而这些人大多并未被列入访谈名单之中^①。在该过程中,地理空间中的身体实践信息被随时分享到数字网络,人们的理想位置可随着这些驻守的粉丝反馈而流动,从而获得较好的参与体验。而在与围观者进行位置交互的同时,人们利用“相近而不连接”的空间界限,也接收着场内观众传达出的语义信号。或是微博的“实时热聊”功能下的图文信息流,或是抖音等平台中内场观众带有共时性的现场直播,在基本需求被社交媒体满足后,外场听众以更持续的媒介使用行为主动搭建起了场馆内外的隔空对话,从眼睛的“观看”变成了通过高科技摄像的“观看”,再造了围墙之外者对内部空间的想象,形成了对列斐伏尔三元辩证法之“再现的空间”的解构与重构。在媒体的参与下,场内和场外的边界被融解,围观者久散不去、甚至愈发组织化,演唱会的场外参与就此突破了虚拟与物理空间的界限,迈向了自愿聚集的独特景观。

五、“第三空间”的规约与动员

(一) 反思:隐性的权力与规范可能

在“第三空间”支持者的描述中,“第三空间”是一个自由流动的空间,人们可以从参与状态中随时撤出。但针对这一点,有学者批判地指出,尽管索亚等20世纪的学者们声称要寻找一种“没有纽带的秩序、一种松散的集体力量”,可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制约性并非是这种容易摆脱的东西。^[20]即这种流动空间虽对外界强制力量具有一定的抵制作用,但内部多种社会关系对空间的建构依然存在。模糊的场景边界承载着流动的权力关系,通过空间中的媒介物或主体在场的位置表现出来。故而权力关系赋予了这个空间形成和演进的内生动力,涉入其中的人也仍然受到空间权力的隐性制约。

首先,是物的规约。“第三空间”内广泛传播的媒介物承载着相似的象征意义,正如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阐述消费社会中提到“表面上看差异为个体配上与众不同的标识,实际上却迫使个体承认对这种编码的认同”^[21],单个的物被纳入整体的环境统筹之中,构成了空间内身份象征物的整体形式。如笔者在演唱会场馆外,见到路边有不少流动摊位出售或赠送歌手相关应援物,直到快散场时仍有许多人驻足观看或购买。这些应援物成为彰显身份的象征符号,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了软性胁迫。由于手持应援物的人与“纯粹听众”在围观时获得群体认同的程度不同,多数观众在情绪感染下,为了追求身份的“共同感”,便也会尽可能通过购买或扫码的方式取得此类媒介物,继而在这一过程中被推动着形成对粉丝编码的认同。

其次,第三空间中参与者身处的位置也会影响其进入与退出。以地缘为直接连接点的社交群体中,会面临更大的地理规约,表征为“由个别群体主导身份建构规则并强加于其他群体。”^[22]如抢占到合适倾听位的人便处于一种“外围的中心”,成为相对的深度参与者,与更多人共享身体在场。这些听众踏入了粉丝群体的归属域,因此虽有随时离开的条件,有时却不得不因为共同参与了主体的构建规则,而在想要临时离开时受到更大的阻力。此外,存在且无法剥离的线上空间,也会在互联网发达的记忆、记录、连接能力下,施加作为评价的第二层审视,影响着共同在场者的个人与群体关系,甚至更改其行为。

最后,虽然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演唱会这类文娱活动,但“第三空间”的建构却并非只在娱乐领域存在。事实上,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就旨在“建构一个公共沟通、舆论和批评的

^① 由于深度采访对象的有限性,在得到的信息趋于饱和后,许多经历相似或未表达出受访意愿的粉丝/群众并未被纳入受访者名单中。

空间”。换言之，20 世纪大众媒体参与之下的政治辩论场，实际就是一种另类的“第三空间”设想。只不过在深度媒介化时代，人的联结方式发生着变化，情感的凝聚价值取代了哈贝马斯最初倡导的“理性”原则，能够促进原子化的公民实现线上线下联合，重构新的公共领域。^[23] 譬如，当今中国不少乡村的自组织政务空间、中央倡导下民众自发参与“互联网+现实”活动等，既有流动性和临时性，又有动员和情动性。这种立足政治的“第三空间”显然蕴含着更大的社会能量，也体现着不同于娱乐领域的社会规约。而探讨其传播逻辑，亦可为分散群体的利用与动员提供有益思考。

（二）展望：“第三空间”逻辑下的社会动员

即便索亚等人多次强调“第三空间”的开放、自由特征，但各种理性观点仍认为，“封闭”原则在规训机制中不是永恒的。换言之，由参与者行动中形成的内生权力会流动渗透于空间内部，且其存在并非完全负面。正由于隐形的权力规约与空间建构相伴而生，有助于阻止社会裂解为原子化的个人和相互孤立的群体，凝聚群体的能力才得以存在。“第三空间”生成和壮大的底层逻辑，来自于多重空间中在地力量和媒介力量的组合。如通过对演唱会场馆外倾听者的软性约束，可以促使其完成向心凝聚；通过媒介的作用，则可以扩大规则的界定范围，传递出更大声量。

毋庸置疑，在重大事件的动员行动中，这种逻辑是可利用的、力量是可动员的。在中国语境下，对群体的利用与社会动员主要体现在以中央为权力发散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仪式和爱国运动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在身份和国家的创造中，国家被想象为有限的空间。”^[24] 在如今的第三空间观中，半开放半闭合、联通精神与物质世界的空间特性和群体间具身的、价值匹配的情感共鸣，则延伸了安德森对“想象共同体”的界定，更多地关注“文化共同体”的实在性空间构想。国家可借助空间视角，以温和隐性的方式对民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进行合理规约，消除官方与民间的对立框架，直至传播主流价值观。

因此，更多社会活动的展开可循此逻辑进行调适和动员。首先，应抓住“外附”于民众的虚拟空间：国家作为公共话语的发起者，可充分融合网络群体的力量，在广泛话题讨论中形成对事件的基础感知；其次，从网络情境和网络空间这一关键场域中向在地化延伸，由于“在面对面沟通之前已经建构了与他者区分的身份认同”^[25]，故而促使跨越多点的线下运动同时开展，如对延乔路献花事件的综合报道，使意识领域的中华“身份名片”落于实地，带动了追思先烈的潮流；最后，在最终的行为发生阶段，则由集体行动者在创造共有意识中作出努力，最终达成共意的提升，推动群体自发行为的落地化、秩序化。

虽然在以上环节的具体实施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流动人员基数大和议题泛娱乐化的问题、引向舆论失焦的困境，但本文认为基于社交媒体的线上动员虽能结成情感共同体，“仅仅在线”的观看却不能代替落于实处的参与。在单纯强调网络空间治理的当下，循着“第三空间”的展开逻辑，将动员群体行为的视野转向精神文化与物质实体并存的公共空间中，亦将为社会治理提供可堪研讨的新命题。

参考文献：

- [1] 李武装. 空间对正义的介入和生产——西方哲学的空间发声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空间批判 [J]. 浙江社会科学, 2018 (12): 86-92.
- [2] 江凌. 城市文化空间的身体消费：以实体书店空间为中心 [J].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5): 57-66.
- [3] 张华. 空间媒介再造城市意象：第三空间视野下的报刊亭 [J]. 现代出版, 2023 (3): 104-113.
- [4] 卞冬磊. 超越虚拟：反思传播研究中的“空间”概念 [J]. 新闻大学, 2023 (7): 71-85+120.
- [5] 中演协. 十一假期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 20.05 亿 [EB/OL]. <https://news.cctv.com/2023/10/07/>

ARTIkfmQcqzOR5YobkhzbxrI231007. shtml.

[6] [法]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58-59.

[7] [美] 爱德华·索亚. 第三空间: 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 [M]. 陆扬, 等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94.

[8] 吴蓉娟. 基于第三空间理论的纪念性景观研究 [D]. 南京林业大学, 2023.

[9] 於红梅, 潘忠党, 陈意如. 探寻第三场所: 一个空间可供性的视角 [J]. 新闻记者, 2023 (7): 45-64.

[10] 王海峰. 共谋的“在场”: 媒体话语与城市边缘空间的生产实践 [J]. 新闻界, 2019 (4): 85-92.

[11] 胡翼青, 张婧妍. 作为媒介的城市: 城市传播研究的第三种范式——基于物质性的视角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6): 144-157+172.

[12] 翟晶. 边缘世界——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研究 [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

[13] 喻国明, 苏健威. 新型趣缘关系: 理解未来社会组织协同的关键视点 [J].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 103-110.

[14] [美] 雪莉·特克尔. 重拾交谈: 走出永远在线的孤独 [M]. 王晋, 等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7: 44.

[15] 李雅琪. 游动的“媒介”: 游泳运动场域中女性身体的转译及传播实践 (1927—1937) [J]. 未来传播, 2023 (5): 90-98.

[16] 牟怡, 官奕聪. 人机传播中社交线索的使用与效应探析 [J]. 全球传媒学刊, 2023 (5): 71-87.

[17] 程红, 林娜. “死信处”: 关于微信“朋友圈”人际交流问题的研究 [J]. 今传媒, 2018 (6): 38-41.

[18] 孙玮. 作为媒介的城市: 传播意义再阐释 [J]. 新闻大学, 2012 (2): 41-47.

[19] 许同文. “位置即讯息”: 位置媒体与城市空间的融合 [J]. 新闻记者, 2018 (6): 12-18.

[20] 唐正东. 苏贾的“第三空间”理论: 一种批判性的解读 [J]. 南京社会科学, 2016 (1): 39-46+92.

[21] [法] 鲍德里亚·让.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M]. 夏莹,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72.

[22] 李静. 第三空间建构: 新新媒介语境下文化间传播范式研究 [J]. 传播与版权, 2022 (5): 50-52+57.

[23] 张淳. 从理性公众到情感公众: 数字时代公共领域的理论嬗变 [J]. 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1-10.

[24]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8.

[25] Gaver, W. W. (1996). Situating action II: Affordances for interaction; The social material for design. *Ecological psychology*, 8 (2): 111-129.

[责任编辑: 高辛凡]